

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与管理学系列教材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张绍焱/主编



中国经
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与管理学系列教材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主编 张绍焱

副主编 赵 峰

中国经济出版社

总序

人类已迈入 21 世纪，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体现高等教育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是为了响应教育部发起的加强大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号召，我们决定编写出版这套《21 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与管理学系列教材》。本系列教材所选科目基本上都是大学经济学类与管理学类本科专业主要课程所用教材。首批计划出版的教材包括：《政治经济学概论》、《公共财政学教程》、《国际金融学》、《宏观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基础理论》、《国际贸易》十种，今后我们将陆续推出其他种类教材。

为了与已有的同类教材相区别，体现本套教材的特色，在编写时，我们坚持以下几个方面指导思想：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经济理论界，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远离实际生活，并主张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介绍，此种观点也相应地体现在教材编写中，许多近期

出版的经济类教材包括《政治经济学》教材，都逐步减少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介绍，而用西方经济理论取而代之。但我们认为，此种做法不妥，虽然马克思的某些经济理论的确是不能指导我们的实际，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马克思的许多经济思想仍能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仍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马克思经济理论真的那么一钱不值的话，马克思也不会被西方某机构评为“20世纪100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之首”了。因此，系列中的各教材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2. 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重贯彻十六大的相关精神，重点研究十六大提及和倡导解决的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积极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3. 体现时代特色。人类脚步已踏入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大学教学内容也应该适应新形势，体现时代特色。我们在编写此系列教材时，将体现时代特色作为编写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各教材都非常强调体系创新、内容创新、写作方法创新以及注重相关数据材料的时效性等等，我们的这一切努力

就是想让读者能从中体味到这套教材的时代特色。

4. 注重素质教育。为了贯彻教育部发起的加强大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号召，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时，注意案例分析，注重安排启发学生思维的相关内容和材料，尽可能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供帮助。

5. 注重借鉴吸收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在编写这套系列教材时，我们参考了大量中外相关资料，借鉴了大量的中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将最前沿、最权威的研究成果融入教材中，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以上是我们编写这套系列教材的主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本系列教材的主要特色，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读者从这些特色中体验到我们这套教材与同类教材的不同之处，并让读者获得从同类教材中收获不到的东西。

参与这套教材编写的同志大都是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一线教师，他（她）们长期从事经济学相关课程教学科研工作，不但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而且对各学科当前的前沿理论问题都比较了解，并且在平时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对相关问题也做了较多的思考，对有些问题有了相当的理论准备。因此，我们期盼本系列教材不会令购买和阅读的诸多读者失望。

最后，谨向为编写本套教材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作者

们、为本书的编写出版提供巨大帮助的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以及经济学院资料室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这套教材的顺利出版与他（她）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系列教材中肯定还存在疏漏之处，希望各位读者、同行能不吝赐教，指出你所发现的错漏之处，以利我们再版或修订时加以改正。

《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与管理学
系列教材》编委会

2005年9月

导 言

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没有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一个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检验和发展的。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本书体现着编者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努力。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范围。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作为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同时，任一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明确的研究对象的界定，可以避免学科研究内容和范围的纠缠和混乱，这应该是学科分工的基本要求。

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邦济世”的“致用之学”，从“经济”概念产生之日起，对财富问题的研究就是其一直的传统。色诺芬将其“经济”界定为个人或家庭谋取财富的学问或技艺，而蒙克列钦通过“政治经济学”将其对财富问题的研究扩展并提升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但直到古典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之前，

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开始的，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为背景。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理解为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对分配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探索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此后，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萨伊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明确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所谓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分法”。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则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即所谓“四分法”。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并没有局限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他们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研究总是结合特定的制度背景的。在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个综合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人类经济行为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离开制度和制度变迁，经济现象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的结合。当然，在古典经济学时期，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进入思想家们的视野。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着两个方面内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的。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作为一门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科学，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具有“问题导向”的特征。服务于经济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或政

治经济学面临不同的研究任务，这就决定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的相对性。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其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公开暴露，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为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 马克思的这一表述，似乎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广义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并不存在并立关系。但是，了解马克思的用语方式就可以知道，由于对生产关系的强调，马克思经常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见，马克思实际上所要表述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但强调其中的生产关系方面。这是由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强调生产关系的同时，经济运行的内容仍然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更因为研究经济运行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马克思正是借助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才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实质和发展规律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

^① 《资本论》第 1 卷，第 8 页。

的科学。”^①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②。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后，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逐渐消退。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或“制度”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应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之后，经济学研究以坚实的步伐不断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③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间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实际上反映的是二者所面临的研究任务的实质差别。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的分析，即对生产关系层次的分析；二是表层层次的分析，即对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② 同上书，第189页。

③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运行层次的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学以成熟市场制度的建立为前提，将其任务确定为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因而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萨缪尔森就认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内容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马克思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为己任而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而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尽管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来源于将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古典经济学，所以二者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交叉。偏重经济运行分析的西方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但它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永恒的前提而分析具体的制度或体制，从总体上说注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偏重生产关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会分析经济运行，但它对经济运行分析的重点是各种生产关系在其中的相互作用及其性质。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力或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内容自然被抽象掉。这一规定，抽象掉的实际上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在古典经济学中，人类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方面和生产力方面得到同样的重视，只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在侧重方面有所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由于具体而现实的研究任务的需要而将侧重点放在了生产关系方面，但对生产力或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并没有偏废。这一规定，也是对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功能认识的扭曲。经济理论总是要服务于特定时代的经济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寻找理论武器，这决定了他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中偏重于生产关系。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急需发展生产力和资源

配置效率，急需改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以提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这样一个急需研究生产力或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效率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却将其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指导，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重要参考，在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具体指导下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进行的系统的理论总结。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对象的确定，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尊重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两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结合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展开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又互为因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则强调的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和现代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面都是由其特殊历史背景下面临的特定历史任务所决定的。我们今天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改善经济运行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视对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因此，尊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和传统，适应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避免单纯研究生产关系和单纯研究资源配置两种极端，而应当是研究一定生产关系或制度背景下的经济运行，它应当包括生产关系或制度和生产力或资源配置两个方面，而且应当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践背景和理论基础

经济理论是人类经济实践的思维形式和逻辑形式，是人类关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认识，是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

经济理论总是以其产生的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的客观经济现象为依据，经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过程的结果。如果这种思维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由此产生的理论便成为科学，从而对其当时及以后的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并被这些经济实践所验证，同时也将伴随后来的实践获得完善和发展。只有辩证地理解思想观念和客观现实的互动关系，才能把握思维观念的变革对于社会变革的真实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践背景，最初来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实践。所以，认真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充分吸取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进行的工作。当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诞生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产生了苏联学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苏联学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全方位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导致社会主义各国纷纷开始改革。在扬弃和突破“苏联范式”的过程中，东欧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以及由于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发展经济学，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变革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新回答，这就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一切都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一条真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② 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高涨时期，但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出现了“苏东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样和复杂的，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 页。

好，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而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经济进程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最主要的实践背景应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关键在于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只有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才具有中国特色，才能实现其解释经济现象和指导经济实践的功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①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我国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还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制度，还存在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随意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客观事实，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问题。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实践是理论产生的土壤。但是，由于知识或理论具有可传承性，因此，既有理论可以成为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起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是在理论的荒漠上进行的，既有的经济理论成果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其发展的基石。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其中，具有根本性和奠基性意义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全面否定到承认其合理性和借鉴性的过程。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的方法，对提高经济学的理论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及提高经济学研究结果

导言

的确定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和以国民收入理论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对提高微观资源配置效率和完善宏观调控效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切，不仅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而且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重要参考，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永恒存在为其理论前提，回避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关系；作为其演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单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严重忽视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切，不仅严重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行为的解释能力，而且使其在根本上丧失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西方经济学中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但从总体上说，不能将其作为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批判、借鉴和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进行深入探讨和科学研究而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指出，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产生，经过一个充分发展过程，又必然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死亡并让位于其他的对于生产力发展来说更适应、因而是更先进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客观规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代表无产阶级先进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正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才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在国际局势变化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形势下，诞生于 100 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还具有解释和指导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已经过时？面对咄咄逼人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给予不容质

疑的回答。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质疑之一是，马克思当年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以致作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判断。以只言片语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价值进行判断，实在是失之偏颇。根据现代科学哲学理论，一种理论范式由核心理论和外围理论构成。在范式发展过程中，外围理论可能由于实践和认识的变化而最早受到冲击，但核心理论受到革命性冲击之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外围受到冲击并改良和修正，有助于核心理论的延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贯穿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怀疑，这说明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过时”。也有一些人用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挫折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这实在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的理解。实际上，造成经济建设实践中的失误和挫折的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误用所致。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了许多原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00多年前，恩格斯就一再强调不能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还有些人从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过时”。这也实在牵强和苛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始人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推断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足够取消商品和货币，因而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不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这样，在他们设计未来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时候，把市场经济排除在他们的思考之外，应该说是极其自然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分化加快和阶级矛盾加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史唯物主义及价值和剩余价值思想不仅不“过时”，反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的重视和认同。不仅马克思被公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最伟大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着越来越多的阅读人群。

马克思的经济学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伟大思想家的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使其基本理论对关于一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基础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入剖析和科学批判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发达商品经济的著作。马克思在这部恢弘巨著中所揭示的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动二重性的矛盾、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矛盾等，都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些内在矛盾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正是这些内在矛盾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经济运行环节的分析及其理论，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析及其理论，关于资本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关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等等，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当然，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践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没有实践过的社会主义提出确切的行动方案。恩格斯早在 1847 年就告诫后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①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 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要与时俱进的，是要根据后来各国的实际历史进程及其实际结果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就是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创新并继续发展这个理论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